

德性的生物学基础及其意义

王鹏飞¹, 胡娟²

(1. 南京医科大学科技处, 江苏 南京 210029; 2. 金陵科技学院思政部, 江苏 南京 211169)

摘要:动物没有道德,但这并不能否定德性是以人的生命形式为基础。人从不会使用语言、无法进行概念推理的婴儿成长为成熟的实践推理者,离不开人的生物学基础;成熟的实践推理者在道德推理中要保持人的同一性,也离不开人的动物性身体。承认德性的生物学基础,才有可能厘清德性与理性的关系,并走出理性主义道德哲学的困境。

关键词:德性;动物性;理性;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B8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479(2012)06-431-003

人类以外的动物没有道德,它们不会使用语言,没有像人一样发达的思维和理性推理能力,不可能像人一样做出道德选择。在道德哲学领域,哲学家们反复强调这一判断的目的,不是要像动物学家那样为动物智力和行为划定一个范围,而是要强调道德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并进一步得出结论:只有在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才能发现道德的实质。严格说来,前一判断是正确的,后一个结论则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需要注释和补充的。

人从一个不会使用语言、无法概念推理的婴儿,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实践推理者,并不是瞬间完成的,它有一个从“动物的人”向“道德的人”或“理性的人”过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事实的存在,没有人会否认,但在道德哲学上,却被哲学家们有意识地忽略掉了。“理性人”假设就是最为明显的表现,这一假设所代表的仅是健康的成人,婴儿、智力有缺陷的人并不包括在内。它往往被看作是进行道德哲学研究的方便之门,在理性主义道德哲学看来,人类的那些不成熟的情绪、思想和行为不仅没有道德意义,而且正是需要道德改造的对象。

有意忽略道德的生物学基础,不仅不能解释个人为什么拥有道德,而且也不能解释在道德推理和道德实践时,人在严重的角色冲突中如何维持人格的同一性。本文将通过介绍麦金太尔关于人的动物

性的思考,从讨论第一个问题开始,说明德性必须以人的动物性生命方式为基础,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德性与身体、依赖性和同一性的关系。

一、婴儿动物性的信念和行动理由

近代关注道德的动物性基础的主要是科学家,如指出动物拥有同情心的达尔文。现代的动物学家继续研究动物的认知、行为乃至情感,这些情感很多都具有道德意义,他们搜集了大量生动、感人的事例,有些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像,比如“在东京一只食鼠蛇奥钦与一只大颊鼠葛汗交上了朋友”^[1],小狗因为主人去世悲痛之极,先僵硬后虚弱,直到心碎而死^{[1]58}。这些例子提醒我们,不要把动物世界想像得过于贫乏。不过,对于严谨的道德哲学理论来说,暂时还不需要走这么远,我们只要在婴儿与高智能动物的对比中,能证实婴儿(并非成熟的实践推理者)已经具有产生德性的基本能力就足够了。

首先,很多动物都拥有信念,这与婴儿产生德性能力所需要的信念是同一种信念。当一只小猫第一次碰到鼯鼠(有毒)会把它当作老鼠,如果吃了一些就会病得很重,从此以后它就再也不会碰鼯鼠了^{[2]60}。猫儿不能给鼯鼠取一个名字,也不会指出鼯鼠其实是哺乳动物而不是啮齿类动物,不过猫儿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信念,“离那个小东西远一点”,这个信念可能仍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06SJD720011)

收稿日期:2012-10-17

作者简介:王鹏飞(1977-),男,山西长治人,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道德哲学;胡娟(1977-),女,山西翼城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道德哲学。

然是不确定的,但是拥有不确定的信念是拥有信念,改变不确定的信念是改变信念,而且重要的是它仍然保持着继续吃小老鼠的信念。把信念归属于动物并没有错。婴儿同样具有这样的能力,当小孩反复咬到一个沾满了辣椒的乳头时,他会慢慢地改变对于乳房的信念和进食的习惯,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对母亲充满信任和依赖。

其次,高智能动物有行动理由,这与婴儿产生德性能力所需要的行动理由是同一种行动理由。饥饿的海豚“侦察员”发现鱼群的时候,会返回去吸引海豚群体过来捕食,而如果它不能把其他海豚吸引过来的时候,就会尽量把鱼群向海豚群体那边赶。海豚这样做的时候,它最初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和它吃鱼的本能暂时是有冲突的,它要把其他成员“叫”过来一起吃,但是当它采取第一种方法达不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它会改变行动,采取另一种方法。显然,这时它拥有一个行动的理由。婴儿在跌倒的时候会大声哭泣,这既是因为疼痛也是为了吸引妈妈的关注,但当他发现妈妈(意识到他伤的并不重)不但没有过来搀扶,反而继续向前走的时候,他停止了哭泣,站了起来,拍拍腿上的土,重新向妈妈奔去了。婴儿没有语言,但他在一个目标没有达到的时候,会改变自己的目标,并选择新的行动方式。

拥有信念、目标、行动,并改变信念、目标、行动并不是道德思考与道德实践,但这是道德思考与道德实践所需要的能力。婴儿在成为一个实践推理者之前就已经拥有了这种能力,这是一种动物性的能力。没有这种生物性的能力,婴儿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理性能力和德性能力。

二、婴儿的生命方式与德性

婴儿的生命方式是一种被社会化的生命方式,他需要在这种生命方式中获得德性,才能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动参与者。

首先,婴儿需要拥有依赖性的德性,才能进入关于“善”的实践。当婴儿已经吃了一块糖,还想再吃第二块、第三块的时候,母亲拒绝了他。这时候,他需要学会的是如何区分欲望和善,或者什么是“好”和“真的好”。最初可能是被母亲强迫把糖从手里夺走,后来则是听从母亲的劝告。他为什么会听从母亲?既是因为慑于母亲强势的权威,也是出于对母亲的依赖和信赖。这种依赖和信赖是一种德性,这种德性是在婴儿的生命方式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种生命方式,要求母亲必须是一个拥有伟大道德的母亲。母亲的伟大之处在于,她通过长期的行动让

婴儿确信,不管发生什么母亲都会对他好,这种道德承诺是无条件的承诺。正是因为生活在这种有强烈道德背景的生活中,婴儿才会拥有依赖性的德性。这种德性帮助婴儿在他人的引导下,学习什么是真正的善。如果没有这种依赖性的德性,婴儿将继续沉沦在自己的欲望中,不能进入关于善的实践。

其次,婴儿需要拥有独立性的德性,才能学会关于“善”的思考。当母亲要求婴儿玩耍几下玩具向客人展示的时候,婴儿这样做了,但当母亲要求婴儿再多做几次的时候,他再也不肯听话了。这个时候,婴儿要学会的是,坚持寻找自己的快乐,而不是一味地取悦大人。他能做到这一点,要求他在他的生命方式中逐渐培养起一种独立的勇敢和坚持,这种独立性是一种德性。这种生命方式,要求母亲有一种美德,母亲所做的任何事情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婴儿本人。当婴儿没有听她的话的时候,也不会因此而生气并打断婴儿的行动。只有在这种道德背景下的生命方式中,婴儿才会学会独立地思考自己的“善”。如果没有这种独立性的德性,婴儿就不能拥有一个对于未来的想像,不能设想一种关于“善”的知识。

在上述生命方式中,婴儿显然还不是完全的实践推理者,他还不能借助于语言进行完整而连续的思维。但是,在这种生命方式中,他已经拥有了一种最为基本的德性能力。德性是先于实践推理的。那种把德性看作是只有理性人才拥有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不过,需要备注的是,德性先于理性却不等于道德本身先于理性,如果母亲没有那种“无条件的道德承诺”、“完全为了婴儿的道德行为”,婴儿就不可能拥有“依赖性的德性”和“独立性的德性”。

三、动物性身体与人的同一性

不仅我们的动物性能力、动物性生命方式在道德产生的阶段具有实质的重要性,而且在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实践推理者之后,离开我们动物性的身体,我们仍然不能进行道德探究和道德实践。

在人生的许多阶段,我们都可能面临角色的冲突、道德的冲突,当这种冲突极其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有人格分裂的危险,如同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反复追问,“哪一个我才是真的自己?”比如,纳粹军官进入集中营后成为严格执行命令的杀人恶魔,而回到家中又成为慈祥的父亲、温柔的丈夫,他像一个演员一样,随着场景的转换准确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但这两种角色本身是严重冲突的,哪一个才是他真实的自己呢?

答案是,这两个都是他自己。因为这都是由他的身体完成的。只有他首先承认这两个角色都是他自

己的时候,他才会进入道德反思,他才会在一个整体人生的意义上思考自己到底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要继续做一个“忠诚”的军人,还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必须思考,他的“忠诚”在什么地方错了。这种“忠诚”的错误,在他个人生活所触及的范围内是不能解释的,他需要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如自己身体所处的德国,欧洲,世界,从古到今的世界,从古到今、再到未来的世界才能做出回答。但是,如果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是他自己身体的行为,他的道德是他的身体的道德,他可能会辩解说,有两个“我”存在,并在两个“我”的转换中怡然自得,完全丧失道德思考的能力。

四、德性优先还是理性优先

基于生物性基础,个体的德性与理性在产生的意义上,德性能力是先于理性能力的;基于生物性的身体,个体的德性思考的是人的身体所处的这个世界,个体的理性思考的是社会关系所及的那个狭隘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德性也是优先于理性的。但是不关注人的身体的理性主义伦理学,却认为理性是优先于德性的。康德认为正当优先于善,同时“除了主体自身的理性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产生正当”^[3];罗尔斯继承了康德正当优先于善的观点,他认为必须把康德学说的力量和内容与其超验唯心主义的背景分离开来,并在一种合乎理性的经验主义原理的框架内予以重铸^[3]。这不仅犯了事实性的错误,而且是一个危险的错误。让我们继续回到集中营大屠杀这个例子,我们将发现仅凭理性连认识到这个错误的力量都没有,更不要说改变这个可怕的后果。

在集中营中,“绝大多数的纳粹党卫军,无论将领还是普通士兵都能轻而易举地通过一般对美国新兵和堪萨斯州警察进行的心理测试。”^{[4]26}这说明什么?说明那些人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是狂热而非理性的!“在招募特别行动队成员和其他同样与真

实的屠杀现场接近的人时,也会格外小心地清除——禁止或者开除——所有异常急切的、性情中的、意识形态立场过于狂热的人。个人的积极性不受鼓励,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使得整个任务公事公办中去,并使之严格地居于非个人的构架之中。”^{[4]27}这说明什么?说明正是那些非常理性的人才能更好地完成整个大屠杀的任务!“如果没有犹太合作者的所作所为,没有犹太委员会委员们的热忱,那么受害者的数量将会有所减少。”^{[4]155}“在把上千的老者、病员和孩子送上死路后,罗姆科斯基宣布‘激励我们的不是……想到会失去多少人,而是想到可能拯救多少人。’”^{[4]186}这说明什么?说明正是受害者的理性在帮助敌人更好地迫害自己人!理性归根结底是工具性的,没有德性的优先,理性只是一种随波逐流的东西。

德性的生物学基础告诉我们,我们在拥有道德选择和道德实践能力之前就已经拥有了最为基本的德性能力,这种能力的持续获得,需要坚持基于生物性身体的同一性。没有生物学的基础,德性不仅不可能产生,而且德性也将重新成为理性的附庸。一旦德性丧失了对于理性的优先地位,道德思考与道德实践就可能被工具化,并最终丧失自己的人文本性。

参考文献

- [1] (美) 马克·贝科夫. 动物的情感世界 [M]. 宋伟, 郭燕, 高勤,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2] (美) Alasdair MacIntyre.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tues [M]. Illinois: Open Court, 1999
- [3] 虞新胜. 论罗尔斯政治哲学中正当的优先性 [J]. 天津社会科学, 2007(6): 35-37
- [4] (英) 齐格蒙特·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 [M]. 杨渝东, 史建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On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virtue and its significance

WANG Peng-fei¹, HU Juan²

(1. Office of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2. Department of Politics, Jinling Technology College, Nanjing 211169, China)

Abstract: Animal has no moral, but this does not negate that the virtue is form the basis of human life. Baby who cannot use language, cannot give the conceptually reasoning cannot grow up into mature practitioner without person's biological basis. Mature practitioner cannot keep the identity without the body of animal personality. Based on recognition of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virtu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e and reason should be clarified probably, and the dilemma of rationalism moral philosophy should be solved.

Key words: virtue; animal; rational; rationalism